

关于盛京内务府的设立时间问题

祁美琴

前不久，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上看到佟永功、关嘉禄两先生撰写的《乾隆朝盛京内务府的设立》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颇有疑点，故撰此文，以求教于两位先生与同行专家。

盛京内务府，又称盛京总管内务府，它是清政府在其陪都盛京所设立的为皇家服务的机构，“掌管清代盛京三旗包衣与宫禁诸事”，^①隶属于北京总管内务府。关于它设立的时间，如佟、关二先生文中所言“清代官方史书及私家著述，或记述不确，或语焉不详”。^②他们经过详细的论证，认为盛京内务府设立于乾隆十七年。^③笔者对此也有一些看法：

一、盛京包衣三旗就是盛京内务府。1644年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留都，也先后仿照北京中央政府机构设立了礼、户、工、刑、兵部，掌管盛京地区政务。对于盛京地区应办之皇室及宫廷事务，则设皇属包衣佐领承办。顺治三年（1646年）始设镶黄、正黄旗包衣佐领各一员。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袞死后，原属多尔袞的正白旗被收归皇帝属下，因此顺治八年又增设正白旗包衣佐领一员，至此，内务府三旗包衣组织同时在盛京成立。从上述盛京包衣三佐领设立的原因和执掌可以看出，其职能和北京总管内务府是一致的。我们又知道，顺治初年的北京总管内务府，其基本组织也是隶属于旗下的皇属包衣组织，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顺治初年的盛京包衣三旗与北京总管内务府在组织上也是相同的。因此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盛京内务府，顺治初年定，盛京包衣三旗设佐领三人，奏简一人掌关防”。^④佟、关二先生怀疑此记载的准确性。但是，如果乾隆十七年确有“设立盛京内务府”之事，而紧承其后的嘉庆朝对此却茫然不知，竟误述为“顺治初年”，似乎更不可信。何况，我们看到康熙年间有“盛京内府佐领”的记载，^⑤也可作为这一组织机构确实存在的又一佐证。因此我们认为盛京包衣三佐领事实上就是盛京内务府组织。

佟、关二先生以档案中盛京包衣佐领使用的头衔为“掌管盛京内务关防佐领××”，而非“掌管盛京内务府关防佐领××”，断言当时无盛京内务府组织。可是我们在佟永功等先生参加编译的《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杂汇编》（辽沈书社1993年版）一书中看到从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初六日起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之前，多次出现“盛京内务府为进送庄头交纳肥鹅等物事咨膳房”等有“盛京内务府”字样的材料。^⑥对于类似的记载，佟、关二先生在文中解释为“在乾隆十七年前的四年（不只四年——引者），‘盛京内务府’之名业经钦定，又有内部机构名称。但只可看作是正式设立前的准备阶段，而非正式设立”。^⑦不知所据何在？

我们研究历史，考查某一组织机构，目的在于了解它的主要社会功能和作用，如果某一机构的确在行使它的职能，在组织上、人事关系上又符合其本来的规定和内容，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存在。因此，我以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盛京内务府这组织是何时出现的，而

是“盛京内务府”这一机构名称是何时确立的问题。也说是说，盛京内务府组织既然随着盛京包衣三旗的设立已经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乾隆朝以前的文献中看不到“盛京内务府”这一名称呢？我认为原因有三：其一，顺治八年即盛京包衣三旗佐领刚刚设立后，顺治皇帝就着手改革，整顿吏治。尤其对当时内廷服务机构内务府的服务体系不满，于是才有顺治十年设十三衙门之举。从此整个顺治年间，连北京总管内务府都置而不用，不给盛京包衣三旗组织冠以内务府之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顺治年间不会有“盛京内务府”之名。其二，康熙所谓恢复旧制内务府，也非昔日单纯起用上三旗包衣组织，而是在原有十三衙门的基础上，重建了一整套的皇属包衣服务机构。这一工作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至雍正元年庆丰司归并内务府和十三年（1735年）将内务府定为正二品衙门，内务府的内部组织体制才算基本确立。所以，康熙年间，北京总管内务府始终处在一个不断整顿与完备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下属机构，即原有的盛京包衣三旗佐领在名称上没有进行改革或组织上的重建是理所当然的。其三，通过康、雍二朝对北京内务府的整顿，内务府这一机构的职能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内务府的组织机构也趋于完备，于是对其下属的内务府组织进行改革和整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因而，“盛京内务府”之称的正式出现应该在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

二、乾隆十七年设立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关于这一点，《清实录》中有很明确的记载：

乾隆十七年正月“庚辰，设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谕曰：盛京包衣三旗佐领等官，皆系职分相等之员，并无统领办事之人，难保无互相推诿及掣肘遗误之处。盛京地方，最为紧要，应行设一总管内务府大臣专辖，将此永著为令。现应增设之缺，著将军阿兰泰兼管”。^⑥

同年二月，又有铸给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印信之谕：

“丙辰，谕：从前盛京因无总管内务府大臣，故佐领等曾许用总理盛京内务府关防。今既设总管大臣，著照例铸佐领图记换给。”^⑦

上述两条材料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乾隆十七年设置的是盛京总管内务府大臣；而第二条材料中“曾许用总理盛京内务府关防”，则再次证明“盛京内务府”之称在乾隆十七年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在此之前，盛京内务府已仿照北京内务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组。

“乾隆十三年十月北京总管内务府会计司咨盛京包衣佐领，将这一年九月初八日钦定的各部院衙门名称满汉文对译缮单附后，其中有：mukden i dorgi baita be kadalara yamun 盛京内务府；weilere arara sy 营造词；dorolon be kadalara sy 掌仪司；buthasara be kadalara sy 都虞司；acabufi bodoro sy 会计司；ilan gusai jodoro arara ku 三旗织造库；dorgi ku 内库；ilan ts'ang 三仓”。^⑧

由此可见，乾隆十七年之前，不仅总管盛京内务府之名业经钦定，而且其内部机构也已经完备。所以我认为总管盛京内务府设立于乾隆十七年的看法值得商榷。

三、总管盛京内务府之名称最晚出现于乾隆元年。《清实录》中最早出现“盛京内务府”之称是在乾隆六年：

乾隆六年十月“户部右侍郎阿里衮奏，盛京内务府三佐领下，有未入旗档人丁约六七千人……此等人丁，并无钱粮 因畏避入丁添差，皆隐匿不报，阅年已久，请敕交盛京内务府三旗佐领等，详悉清查，造入丁册……”。^⑨

笔者在翻阅《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一书时，分别在乾隆元年（1736年）和六年两件档案的附本中，发现在记述乾隆元年和二年的事件中，使用了“盛京内务府”一名。现摘

录如下：

1、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佐领八格等为造送拨给诚亲王府庄头地亩人丁等项清册事呈总管内务府”，正文后有“附：盛京内务府正黄旗分拨与诚亲王爷家庄头、壮丁、花名、家口、户产、牲畜、地数清册”。^①

2、乾隆六年五月十五日“佐领实图等为造送旷夫怨女领去恩赏银册事呈总管内务府”，正文后有“附：乾隆二年五月内投过盛京内务府所属大粮庄头属下旷夫一百六十九名，怨女三名，每名应得恩赏银七两，以上共应领银一千二百零四两”。^②

以上事实说明，“盛京内务府”之称的出现不会晚于乾隆元年。

① 《满族大辞典》第 663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②⑦⑩ 佟永功、关喜禄《乾隆朝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 年第 2 期。

③ 李鹏年等编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 416 页也有“乾隆十七年，盛京设立内务府”之说。紫禁城出版社 1989 年版。

④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八六。

⑤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二，页十一，总第 842 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5 年版（下同）。

⑥ 辽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第 514—547 页。辽沈书社 1993 年版。

⑧ 《清高宗实录》卷四〇七，页一，总第 333 页。

⑨ 同上，卷四〇九，页七，总第 364 页。

⑪ 《清高宗实录（二）》卷一五三，页十四，总第 1187 页。

⑫ 同⑩书，第 411—412 页。

⑬ 同⑥书，第 456—457 页。

（上接第 21 页）

⑭ 《康熙起居注》，第 905 页，下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⑮ 《康熙起居注》，第 1024 页、第 1028 页。

⑯ 施琅：《靖海纪事》（富鸿基·序），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 11（本朝时事）。

⑰ 《清圣祖实录》卷 111，第 10 页—11 页，下同。

⑱ 《清圣祖实录》卷 111，第 33 页。

⑲ 《康熙御制文集》卷 38 下《中秋日闻海上捷音》。

⑳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 11（本朝时事）。

㉑ 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卷 6《舆地既广 请立规模》。

㉒ 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恭陈台湾弃留疏》。

㉓ 《康熙起居注》，第 1127 页。

㉔ 笔者于此有专文论述，请参见《康雍乾时期汉族、高山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及其原因》，刊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